《学术界》(月刊)
总第278期,2021.7
ACADEMICS
No.7 Jul. 2021

西学东渐与近代中国社会科学的发生〔*〕

姚宏志
(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摘　要〕近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知识和理论体系产生于西方,是工业革命和城市化发展的结果,非西方国家的社会科学通常是从西方引进或传入的。伴随着西学东渐的大潮,西方近代社会科学传入中国。中国知识界在积极传播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同时,努力推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近代转型。在此基础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逻辑学等近代中国社会科学开始了孕育和生长。

〔关键词〕西学东渐;西方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1.07.008

近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知识和理论体系产生于西方,是工业革命和城市化发展的结果,是西方近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西方国家的社会科学通常是从西方引进或传入的,近代中国自然也不例外。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时代大潮,西方近代社会科学渐次传入中国,并以甲午战争为界大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中国知识界在积极传播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同时,努力推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近代转型。在此基础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逻辑学等近代中国社会科学开始了孕育和生长。

一、西方近代社会科学输入中国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外来文化输入。一次是印度佛教文化的输入,自东汉时期开始,中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拓展发扬,前后绵延500余年,最终实现了佛教中国化。另一次是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输入,史称“西学东渐”,自明朝末年算起,直至民国时期,前后历经300余年。西方近代社会科学就是伴随着西学东渐的大潮传入中国的。

所谓“西学”,即西方学术文化,是包含社会科学在内的西方学术思想、学术组织、学术制度等的总称。“西学”概念早在明朝末年就已经出现,一些书籍甚至以此冠名。如传教士艾儒略编述的《西学凡》(1623年)一书,以答述形式将当时欧洲大学所授各科课程按照文科、理科、医科、法科、教科、道科(即神学)六部分编纂而成,并提纲挈领地介绍了7000余种西书。传教士高一志编写的五卷本《齐家西学》(1624年)、四卷本

作者简介:姚宏志,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本文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1921—1949)”(19BKS004)的阶段性成果。

《西学治平》(1630 年)、《修身西学》(1630 年)等书,用西方观点阐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中国儒家思想文化。西学之所以东渐,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欧洲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生产力、科学技术获得了很大进步,资产阶级正按照自己的意志构建起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另一方面,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导致社会发展停滞不前,已经缺乏通过自我革新、自我调节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动力和因素,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正日益扩大。

明末清初,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来华,掀起了第一轮西学东渐热潮。从 16 世纪中期到 18 世纪,来华耶稣传教士累计 450 余人,加上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奥斯定会等教派传教士,总数达千人以上。[1] 他们来华前都经过了严格培训,除宗教知识外,还掌握天文、数字、地理等知识。几乎所有传教士来华时都携有数量不等的西学书籍,有人把译介西洋科学、传播欧洲文化当作打开中国大门的敲门砖。[2] 据统计,自利玛窦来华到康熙禁教,再到耶稣会被解散,200 年间耶稣会传教士译述的西书中,宗教类 251 种,自然科学类 131 种,大致归入社会科学领域的仅 38 种,涉及逻辑、心理、伦理、地理、教育等内容。[3] 如利玛窦 1595 年编著的《西国记法》《交友论》两书,前者是西方传入中国的第一部神经学及心理学著作,后者摘录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关于友谊的诸多论述。傅汎际译意、李之藻达辞的十卷本《名理探》(1631 年),是介绍欧洲逻辑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最早著作。此外还有艾儒略译、杨廷筠笔述的五卷本《职方外纪》(1623 年)、艾儒略著的两卷本《西方答问》(1637 年)、利类思等编著的《西方要纪》(1668 年)、南怀仁编著的《坤舆图说》(1674 年)和《坤舆外纪》(1697 年)等。与西方科学技术、天文历法、军事技术、医学药学、采矿冶金等自然科学书籍以及宗教文献的译介相比,跟社会科学相关的西书译介显得微乎其微。而且严格地说,这些传教士所编撰和译介的西书尚不能称为近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毕竟,这时的欧洲,近代社会科学尚在孕育之中。

西学的东传,无疑给中国知识界输入了新鲜空气,开拓了中国知识分子和士大夫的眼界。当然也要看到,这些耶稣传教士介绍的西学,是个新旧杂糅的混合体,既有“新学”,也有“古学”“旧学”,有的尚停留在欧洲古典科技和古希腊时代的水平上,有的甚至无法撇清与欧洲中世纪宗教神学的关联。有研究者据此批评他们:“对十六世纪出现的那些最富于革命性、危及封建神权基础的自然科学成就,却缄口不谈。例如哥白尼的‘日心说’、伽利略的物理学、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大定律’,都是科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对于这些新学说,来华的耶稣会士,有的人是知道的。但他们守口如瓶,不作介绍;或者在介绍中偷梁换柱,加以歪曲。”[4] 也有研究者对此观点提出反驳:“我们不要忘记,十七世纪中叶所有的合格的科学家与差不多所有的哲学家,都从基督教的观点去观察世界。宗教与科学互相敌对的观念是后来才有的。”[5]

经过 18 世纪中后期几十年的中断,到 19 世纪初,西学东渐又以新的方式呈现,担任这次先锋角色的不是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而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以马礼逊为代表的新教传教士来华,揭开了新一轮西学东渐的序幕。早期新教传教士主要在南洋、广州和澳门一带活动,鸦片战争后,他们通过《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以东南沿海通商口岸为据点,热心传播宗教,同时翻译了数量可观的西书,包括社会科学方面的部分书籍。据统计,1810—1867 年,新教传教士译述西书 795 种,其中宗教方面 687 种,占 86%;自然科学方面 47 种,占 6%;而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等方面只有 27 种,占 3%。[6] 跟社会科学有关的书籍有:麦都思编的《东西史记和合》(1829 年)对中国、欧洲重大文明创造、历史事件的记载;郭实腊编的《大英国统志》(1834 年)、《万国地理全集》(1838 年)、《古今万国纲鉴》(1838 年)、《制国之用大略》(1839

年)、《贸易通志》(1840 年)等对世界各国历史特别是欧洲史、西方商业制度、贸易情况的介绍;玛姬士辑译的《外国地理备考》(1847 年)对各洲地理位置、政事制度、历史文化、宗教风俗的介绍;裨治文著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1838 年)和《联邦志略》(1861 年)对美国历史地理、政治制度、风土人情的详尽介绍;卢公明著的《华人贫苦之故》(1858 年)对华人贫苦原因的分析等。这些西书成为随后林则徐、魏源、梁廷枏、徐继畬等了解世界情况的重要资料。[7]

19 世纪 60 年代,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打击,侵略者逼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使得清廷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强大威力。为了解除内忧外患,实现富国强兵,他们开始主动学习西方科技和文化,洋务运动于是兴起。此后一段时间,西学传播主体不断扩大,除传教士外,新增洋务派官员、学校教习、中外译员、报刊编辑等。西学传播机构不断增加,除教会组织外,新增政府译书机构、新式学校等。西学传播内容出现变化,自然科学书籍不断增加的同时,社会科学书籍日渐增多。西学传播对受众的影响逐渐从先前的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向普通市民和社会基层扩展。1896 年,梁启超编撰《西学书目表》一书,收录了 1871—1894 年间我国翻译出版的西书 352 种,分为西学、西政、杂类三大类,跟社会科学相关的书籍大约 80 余种。

这一时期要特别提到翻译出版西书的两类机构及其所译的西方近代社会科学书籍,它们在西方近代社会科学早期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类是清政府创办的译书机构,如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大规模有组织地翻译引进西方系统性科学学科,始于京师同文馆。作为新式外语学校,同文馆创办于 1862 年,主要任务是培养西学人才;而最能体现学生西学水平的,就是西书翻译。同文馆存续期间,共译西书 36 种,其中社会科学书籍有 10 余种,包括《富国策》(1863 年)、《万国公法》(1864 年)、《公法便览》(1877 年)、《公法会通》(1880 年)、《法国律例》(1880 年)等。《富国策》由传教士丁韪良组织力量翻译,最早将西方近代经济学理论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是中国知识分子学习西方近代经济学理论的最重要著作。[8]《万国公法》亦由丁韪良翻译,是第一本中文版西方国际法学著作,首次将近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思想观念以及概念术语带到中国。[9]该书是中国通商口岸地方官员以及所有涉外人员的必读书目,影响广泛。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是清政府创办的出版书籍最多、社会影响最大的译书机构,前后出版西书 180 种,以自然科学居多,社会科学方面有 33 种,包括政法、交涉、兵制、商务、学务等。[10]比较重要的有《防海新论》(1874 年)、《列国岁计政要》(1878 年)、《东方交涉记》(1880 年)、《佐治刍言》(1885 年)、《东方时局论略》(1889 年)、《公法总论》(1894 年)等。《防海新论》由传教士傅兰雅翻译,是近代中国第一本外国军事理论著作,对晚清军政要员产生了重要影响。[11]《佐治刍言》亦由傅兰雅翻译,是戊戌变法前介绍西方政治和经济思想最系统的一部书。梁启超赞誉其“探本穷原,论政治最通之书”,“言政治最佳之书”。[12]有研究者认为康有为的《大同书》曾受其影响。[13]值得一提的还有《西国近事汇编》,该书主要根据英国《泰晤士报》等编译而成,自 1873 年至 1899 年,每年出一卷,介绍西国大事要闻,成为中国人了解西方世界的重要参考书。梁启超曾极力推介此书:“欲知近今各国情状,则制造局所译《西国近事汇编》最可读,为其翻译西报,事实颇多也。”[14]

另一类是传教士主办的出版机构。19 世纪 60 年代前,教会出版机构一统天下,此后直至 90 年代,随着官办译书机构的兴起,开始了两类出版机构并峙时期。这一时期教会出版机构主要包括美华书馆、益智书会、广学会等。特别是广学会,原名同文书会,成立于 1887 年,1894 年改现名,宗旨主要是编印刊物,出版西书,介绍西

学。广学会以及来华传教士创办的所有报刊杂志中,传播西学内容最多、发行最广、名气最大的当属《万国公报》,内中不但有连载的西学译述,而且消息报道、时事评论中也含有西学内容。这些刊载的西学中,比较有份量的,多以单行本形式面世。据统计,1888—1898 年广学会共出版西书 56 种,大部分为社会科学书籍,其中不乏有影响的著作。[15] 如《中西关系略论》(1876 年)、《自西徂东》(1888 年)、《天下五洲各大国志要》(1892 年)、《富国养民策》(1893 年)、《百年一觉》(1894 年)、《泰西新史揽要》(1895 年)、《中东战纪本末》(1896 年)、《文学兴国策》(1896 年)等。《自西徂东》是传教士花之安最具代表性的中文著作,分仁、义、礼、智、信共 5 集 72 章,将西国政事与中国现状相比较,宣传中国仿行西法。该书是广学会发行量最大的书籍之一,对中国士人及官员影响巨大。[16]《百年一觉》由传教士李提摩太翻译,原是一部幻想小说;该书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计,对维新派思想家很有启发作用。康有为说它"是'大同'影子",[17] 谭嗣同认为它"殆仿佛《礼运》大同之象焉"。[18]《泰西新史揽要》是李提摩太最重要的译作,全书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叙述了 19 世纪欧美各国发展史,是晚清销量最大、影响最广的西方历史学译作。[19]

总之,从明末清初到甲午战争前后,在 300 多年的西学东渐大潮中,不仅西方的科学技术、天文历法、军事技术、采矿冶金、医学药学等自然科学得到大量传播,而且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地理、教育外交等近代社会科学也得到初步译介。明末清初之际,传教士在儒学外衣的掩护下,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主要从物质层面用西学来改造和影响中国文化,其时尚未危及到国家与民族的政治和道德秩序,整个社会亦能平静地看待作为异质文化的西学,并用欣赏的眼光和心态接受其物质成果,西学的影响范围十分有限。但是,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封建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已经逐渐不适应迅速变革的近代社会,如何对待强势的西方科学文化,以及如何建立适应社会变革需要的文化特别是一套思想体系和意识形态,就显得十分迫切。[20] 在此背景之下,不仅西方传教士传播西学更主动,而且国内知识分子和士大夫开始关注西学并积极传播西学。他们不仅十分关注和积极传播西方自然科学,而且开始对西方近代社会科学投入更多的精力,积极地将它们引入中国,推动它们在中国的迅速传播。

二、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迅速传播

1894 年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之前还没有哪次战争对中国思想界的冲击超过它。虽然清政府多次被欧洲列强欺凌过、打败过,但终究以虚幻的方式极力维护着所谓"天朝上国"的尊严。这一役却迥然不同,泱泱大国竟然惨败于"蕞尔小邦"日本,并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随后资本—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清政府在这场战争中颜面尽失,中国人再一次品尝到割地赔款的屈辱滋味,中华民族已经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梁启超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21] 甲午战败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灾难,也刺激着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刺激着人们思考和探索中华民族的新道路。这样,在甲午战争前还比较微弱的维新变法呼声,战后一跃成为不可遏制的社会思潮,并最终导致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

资产阶级维新派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西学的浓厚兴趣,或以上疏或以著文形式,要求自上而下实行变法,把兴西学和译西书作为维新变法的重要举措,公开宣称:"苟其处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昭昭然也。"[22] 1894 年,马建忠上疏《拟设翻译书院议》,强调书院应主要翻译以下三类西书:一是"各国之时政",即议院立法、各国交涉、外部往来信札、新议条款等方面书籍;二是"居官者考订之书",即行政、治军、

生财、交邻等方面书籍;三是“外洋学馆应读之书”,即自然科学书籍。[23]以上三类西书中,除第三类外,第一、二类主要是社会科学书籍。此后,李端棻、杨深秀、李盛铎、盛宣怀、孙家鼐、梁启超等先后上疏,奏请“开译书局”“开馆译书”“设译书院”“设翻译学堂”等,提出不仅要翻译西方自然科学著作,更要翻译西方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历史等社会科学书籍。1897 年,高凤谦在《时务报》发表《翻译泰西有用书籍议》一文,强调西方政治学书籍翻译的急迫性:“泰西有用之书,至蕃至备。大约不出格致政事两途。格致之学,近人犹知请求。制造局所译,多半此类。而政事之书,则鲜有留心,译者亦少。”“不知中国之患,患学在政事之不立。而泰西所以治平者,固不专在格致也。”“此翻译政事之书所以较之格致为尤切也。”[24]在维新派看来,为了实现国家富强,仅靠西方技艺和自然科学不能解决问题,还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社会制度。于是,变革中国传统社会制度的任务被提上议事日程,为制度变革开辟道路的西方社会科学开始受到维新派青睐。在维新派(后来是民主派)的积极倡导下,西方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政治学说的翻译出版掀起了热潮,涌现了一批有影响的人物及其译作。

这方面首推严复。严复是翻译西方社会科学著作水平最精、贡献最大、影响最深的思想家,先后翻译了英国赫胥黎著的《天演论》(1898 年)、英国穆勒著的《群己权界论》(1903 年)、英国甄克思著的《社会通诠》(1903 年)、法国孟德斯鸠著的《法意》(1904 年)等著作,系统介绍了西学,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法律、伦理、社会学、哲学等诸多社会科学领域。严复将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介绍到中国,使中国知识界的观念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在当时,进化论是作为西方科学被接受的,但又成为接受西方科学的前提条件,因为它揭示了西方强大的原因在于追求进化而造就的发达科学。与此同时,进化论向中国人展示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儒学传统的动辄以“三代”、文武周公为号召的全新世界观,阐明了科学发达与社会发达的必然联系,从而为急切寻求富强之道的中国人学习科学提供了最初的理论依据。[25]胡适强调指出:“严复是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26]任继愈认为他“是中国最早最系统地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理论和学术思想,宣传资本主义‘西学’‘新学’以与封建主义的‘中学’‘旧学’相抗衡的首要代表人物。”[27]严复在中国社会科学近代化中所做的工作是开创性的,奠定了新时代思想家们把现代科学作为一种价值体系而接受的基础。[28]

其次是梁启超。戊戌变法前,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组建大同译书局,编辑“西政丛书”。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创立广智书局,撰写《各国宪法异同论》《国家论》《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等系列文章,大力介绍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学说,同时翻译《现今世界大势论》《近世欧洲四大家政治学说》等社会科学书籍,介绍欧美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就译作的学术地位和思想影响而言,梁启超虽然不能与严复相提并论,但他通过批评洋务运动时期的器物翻译取向,建议译者选择适当的西书来译,特别是要翻译西方的政治、经济、法律等著作,从而为这次翻译转向提出了方向性意见。严复的翻译实践和梁启超的大力倡导,对中国近代翻译从单纯的器物翻译取向转向社会科学翻译和科技翻译并重局面发挥了重要的引导性作用。[29]有研究者指出,梁启超通过对日译本的翻译,在中国特别成功地传播了西方社会科学。[30]

再次是赵必振。戊戌变法前,赵必振倾心改良维新。变法失败后,赵必振亡命日本,参与《清议报》《新民丛报》的编校工作。1902 年赵必振潜回上海,从事译述工作,此后二三年从日文译介社会科学书籍 20 余种。这些译书大致分三类:一是社会主义书籍,如幸德秋水著的《二十世

纪之怪物帝国主义》(1902 年)和福井准造编著的《近世社会主义》(1903 年),前者主要批判列强尚武用兵的殖民政策,指出 20 世纪主要危险是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该书是分析批判帝国主义的首本中文译作;后者重在介绍法国革命后欧美国家的社会主义历史及其社会党的现状。二是"史学小丛书",包括《埃及史》《亚西里亚巴比伦史》《土耳机史》《亚剌伯史》《波斯史》《腓尼西亚史》《犹太史》等 7 种,这些国家大多是历史上的文明古国,后来无一例外地由盛而衰直至亡国。作者译介它们的历史,显然不是随意选取的,而是与中国面临的瓜分豆剖境地紧密相关。三是人物研究,既有如《拿破仑》《亚历山大》《戈登将军》等对个体重要人物的研究,也有如《日本维新慷慨史》《世界十二女杰》《东洋女权萌芽小史》等对群体重要人物的研究,特别是译介《日本维新慷慨史》,目的是借鉴明治维新的主要经验和成功做法,激励国人卧薪尝胆、发愤图强。

最后是范迪吉。1903 年范迪吉受上海会文学社邀请负责编译"普通百科全书",把"凡关于学理、政术与种种科学有影响于诸科学之发达进步者,皆在是书范围内涵容无遗";选译的底本标准是:"日本最有力学者之名著,且系最新最近出之书"。[31]作为首部以"百科全书"命名出版的中文译本,"百科全书"共 100 种,其中社会科学 50 种,按照初级学、普通学、专门学三个系列由浅入深地加以编排,涉及政治学、法律学、哲学、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教育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百科全书"于 1903 年翻译出版,为中国人学习西学知识、了解西学知识体系,为更高阶段的"研精"和"互证"奠定了重要基础。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认为,"百科全书"是中国留日学生翻译史上的"大事业","可以作为本年度汉译日本书的最高成绩的代表"。[32]这是对"百科全书"的整体性评价,其中自然蕴含着对社会科学的肯定性评价。

除上述四人外,译介和传播西方社会科学的人物还有章太炎、王国维、蔡元培、麦孟华、麦鼎华、张知本、朱宝绶、沈纮等,他们不遗余力地将西方社会科学书籍介绍到中国,使得西方社会科学书籍的翻译出版大增。

甲午战争之后,西方社会科学之所以迅速传播,这与清末留学运动的兴起是分不开的。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迫于内外交困的严峻形势,清政府决定推行"新政",制定和出台新的留学政策,鼓励和派遣留学生,国内随即掀起一股留学潮,目的地主要是美国、欧洲和日本,其中尤以日本为多。据统计,1900—1907 年的留美生仅百余人,到 1911 年达到 650 人。1903—1911 年,在英、德、法、奥、比等国的留欧生约 500 余人,而 1896—1911 年的留日生不低于 4 万人,特别是 1905—1908 年间,每年留日生不少于 5000 人,1906 年甚至高达 12000 人。[33]与欧美相比,日本能够成为海外留学的首选目的地,不仅在于中日两国地理上的"一衣带水"、文化上的"同种同文",以及留学生活费相对低廉、经济负担远比留学欧美学生轻,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日本被视为通过以西方为榜样的改革而已经强大起来的典范。[34]

这一庞大的留学生群体,特别是留日生群体,成为西方社会科学传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据谭汝谦统计,1896—1911 年,中国和留日人员中翻译出版日文书籍共计 958 种,其中社会科学 541 种,占 56%。[35]这个数字远远超过此前半个世纪中国翻译西方社会科学书籍的总和。另据杨寿清统计,1902—1904 年共译西书 533 种,其中哲学、政治、经济、教育、历史、地理等社会科学书籍 298 种,占总数 56%;而同期翻译自然科学书籍 168 种,占总数 32%。这些译书中,译自日文的 321 种,占 60% 强;译自英文的 89 种,占 16%;译自德文的 24 种,占 4%;译自法文的 17 种,占 3%。[36]译自日文的明显多于其他外文。在此期间,中国和留日人员中翻译出版日文西书的机构有 116 所,[37]突出的有译书汇编社、会文学社、闽学会、教科书编译社、湖南编译社、

国学社等。他们除翻译出版书籍外,还创办了为数众多的杂志,如《开智录》《译书汇编》《国民报》《新民丛报》《游学译编》《新译界》《大陆》《新世界学报》《政法学报》《湖北学生界》《江苏》等。留日生所办期刊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内容上也较同期国内期刊为优,成为当时传播新思想的重要媒介。这样,以甲午战争为分水岭,中国人对域外思想资源的学习由先前的以欧美为师转而效法东洋,这一转变对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传播乃至近代中国思想文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近代中国社会科学的发生

在西学东渐的时代潮流中,中国知识界积极介绍和传播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并努力运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改造中国传统学术,推动着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近代转型。在此基础之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逻辑学等近代中国社会科学开始了孕育和生长。

(一)经济学

"经济"一词最早见于《晋书·长沙王传》:"同产皇室,受封外都,各不能阐敷王教,经济远略。"古汉语中的"经""济"常分开用,前者指治理,后者指救济,两字连用时多指经世济民、经邦济国之意。这与西方社会科学中的"经济"概念显然相距甚远。因此,当英语"economy"最初被译成中文时,一段时间内并没有采用"经济"概念,而是从中国传统词汇中找到与之大致匹配的词汇,如"富国""富国养民""理财""生计""平准""资生"等。相应地,"economics"被译成"富国策""富国学""富国养民策""富国养民学""理财学""计学""生计学""资生学"等。

从洋务运动开始,西方经济学著作被译介到国内。如法思德著的《富国策》(1880 年)、哲分司著的《富国养民策》(1886 年)、傅兰雅著的《富国须知》(1892 年)、李提摩太著的《生利分利之别论》(1894 年)、嘉托玛著的《富国真理》(1899 年)、马林著的《富民策》(1899 年)等。这些是当时英国比较流行的经济学著作,译者均为传教士;除《富国策》外,其他译作质量均不高。甲午战败后,西方经济学说的译介任务被上升到国家存亡高度,"吾国经济问题,即吾国存亡问题,欲解决此问题,则非输入学说不为力"。[38] 自此,西方经济学著作的译介在世纪之交掀起高潮,比较重要的如亚当·斯密著的《原富》(1901 年)、谢卫楼著的《理财学》(1902 年)、持地六三郎著的《经济通论》(1903 年)、天野为之著的《理财学纲要》(1903 年)、田尻稻次郎著的《二十年来生计剧变论》(1903 年)和《理财学精义》(1903 年)、金井延著的《社会经济学》(1905 年)、山崎觉次郎著的《经济学》(1905 年)、松崎藏之助著的《经济学要义》(1906 年)、麦喀梵著的《经济原论》(1908 年)等,它们都被翻译了过来。特别是严复译的《原富》,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当时中国输入西方经济学的最重要著作。

伴随着西方经济学的传播,经济学开始作为科学受到重视,并被纳入学校专门科目和课程体系之中。早在 1867 年,北京同文馆开设经济学课程,名为"富国策",教习是丁韪良,教材是英国经济学家法思德著的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当时译为《富国策》,现译为《政治经济学教本》。这是目前所知以授课形式传播经济学的最早记录。在北京同文馆的示范下,广州同文馆、上海中西书院、潞河书院等洋务学堂纷纷效仿,相继开设"富国策"课程。1897 年,传教士李佳白向总理衙门呈递说帖,提议京师设立总学堂,并将"富国策"作为其中开设的科目之一。[39] 1902 年,张百熙主持拟定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商务科"为大学七科之一,下设簿记学、产业制造学、商业史学等六目。1903 年,京师大学堂聘请杉荣三郎为教习,讲授"经济学"课程,讲稿经整理后由商务印书馆于同年出版,名为《经济学讲义》。这可能是第一本冠名"经济学"的中译本,也是一本极有影响的经济学著作,当年便有 4 种版本。[40] 差不多从 1903 年开

始,以“经济学”冠名的译作迅速增多,逐渐取代了其他译名。这样,经济学不仅在名称上有了科学概括,在内容上有了西方经济学的大量译介,在制度性上也有了规范科目和课程设置,标志着近代中国经济学的产生。

(二)政治学

政治学在中国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产生于20世纪初,主要得益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章太炎等人把西方的国家学说、契约论、民主自由、天赋人权、议会和政党制度等政治学理论大规模地介绍到中国。一些重要的西方政治学著作甚至不止一个译本,如卢梭著的《民约论》被杨廷栋译为《路索民约论》(1902年),穆勒著的《论自由》被马君武译为《自由原理》(1903年),孟德斯鸠著的《论法的精神》被张相文译为《万法精理》(1903年)等。一些在欧美、日本流行的政治学著作在国内陆续出版,仅以“政治学”命名的译作就有近10本,如伯盖司著的《政治学》有译书汇编社(1900年)和作新社(1903年)两种译本,那特砬著的《政治学》有广智书局(1902年)和商务印书馆(1904年)两种译本,小野塚喜平次著的《政治学》有法政丛编社(1905年)、丙午社(1906年)、商务印书馆(1907年)三种译本。这一时期比较突出的政治学译作还有:高田旱苗著的《国家学原理》(1901年)和《政体论》(1903年)、市岛谦吉著的《政治原论》(1902年)、威尔逊著的《政治汎论》(1903年)、菊池学而著的《宪政论》(1903年)和《议会政党论》(1903年)、纳岌尔布礼著的《共和政体论》(1903年)、石川条著的《欧美政党论》(1903年)等。据统计,1901—1904年各书社翻译出版的西方政治学著作约有66部。[41]正是这些文献大大缩短了中国人探索现代政治学范式的距离。

伴随着西方政治学著作及其思想的译介,国内加快了政治学的科学化建设步伐,特别是在新式学校中开始筹划设立政治学科。1896年,梁启超上书张之洞,建议设立“政治学院”,[42]强调重视政治人才的培养。1898年,京师大学堂正式批准设立,由总理衙门拟定的《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根据西方通行学校的功课种类制成的功课分类表,包括了初级政治学和高等政治学。[43]由于戊戌变法失败和八国联军入侵,1902年才正式开办京师大学堂,并设立了仕学馆,实际上成为后来大学政治学系的前身。与此同时,张百熙主持拟定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首次制订了大学分科分系制度,规定大学应该分设七科,其中“政治科”排序第一,下设政治学、法律学两目。不过该《章程》并没有得到执行。1904年清政府正式颁布张百熙等人重新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其中原“政治科”改为“政法科”,下设政治门、法律门两门。实际上直到6年后的1910年1月,京师大学堂才正式开办分科大学,首次招收本科生。

(三)社会学

“社会学”汉语的最早出处可能源自谭嗣同的《仁学》(1896年):“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44]谭嗣同是将“社会学”与算学、格致并列在一起的。不过这一名词当时并未流行,思想界用得较多的还是“群学”概念。康有为1891年在广州万木草堂创设长兴学舍,聚徒讲学,宣传维新变法主张,在《教育大纲》中设“群学”课程,与“政治原理学”等课程并列为“经世之学”。严复1895年在《原强》中系统介绍西方社会学创始人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认为该学说“宗其理而大阐人伦之事,帜其学曰群学”。[45]梁启超1896年作《〈说群〉序》《群理》《新民说·论合群》等文章,对“群学”作了创造性发挥,提出“以群为体,以变为用”[46]主张,对变法维新思想作了新概括。严复于1897年着手翻译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著作,1902年译完并以《群学》之名铅印,翌年以《群学肄言》书名由文明译书局出版。该书是直接翻译西方社会学的首部著作,影响很大。

首次用“社会学”命名西方社会学译作的是章太炎。他于1902年翻译了日本社会学家岸本

能武太著作《社会学》,称道该书:“卓而能约,实兼取斯、葛二家”。[47]这里的“斯”“葛”分别指斯宾塞、吉登葛斯。换言之,该书是综合斯宾塞、吉登葛斯的社会学理论而成。同年,吉登葛斯著作《社会学提纲》由吴建常由日文转译成中文并出版,书名为《社会进化论》,中心思想是宣扬生存竞争,强调优胜劣败原则。此后二三年间,各种含“社会”或“社会学”名词的译作渐次多起来,涩江保著的《社会学》由开明书店出版,大原祥一著的《社会问题》由闽学会出版,马君武译的《斯宾塞社会学原理》由西江欧化社、广雅书局同时出版,有贺长雄著的《族制进化论》《社会进化论》《人群进化论》三部作品由广智书局相继推出。

在学科制度化建设方面,一些新式学堂开始设立社会学课程。1904 年,上海的圣约翰学院开设社会学课程,由门·阿瑟主讲,教科书名为 *Walter Bagehot's Physics and Politics*。[48] 1906 年,京师政法学堂章程明确规定,在正科政治门第一学年课程表内,安排“社会学”课程,时间为 2 小时。1910 年,在改订的学堂章程中,除了继续执行前述课程表规定的“社会学”课程及相应时间外,在第 3 学年增加“工业政策”和“社会政策”课程,时间为 4 小时。同年,京师大学堂规定,政法科政治学门在第一学年开设“社会学”课程。1913 年,上海的沪江大学设立社会学系,教师主要来自美国的布朗大学。这是中国高等学府设置的第一个社会学系。

(四)历史学

史学为中国古代学术所固有,博大精深。梁启超说:“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49]近代以降,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西方社会科学的涌入特别是进化论的传播,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史学由传统的经世史学向以进化论为指导的新史学转变。梁启超是新史学的奠基人,他于 20 世纪初相继发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等文章,首次明确提出“史学革命”主张,大声疾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50]正式揭橥“史界革命”旗帜。

新史学的兴起适应了时代发展要求,引起史学界乃至思想界的巨大反响,并一度成为中国历史学的主流。新史学的成就突出地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西方新史学理论及方法的介绍,特别是日本史学家坪井九马三、浮田和民著作及其思想的译介。1902 年,留日学生汪荣宝在《译书汇编》发表《史学概论》译作,主要依据就是日本史学界元老坪井九马三著作《史学研究法》,同时参考了浮田和民等人的论著。作为系统介绍西方近代史学方法论的重要著作,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在中国影响很大,并于 1902—1903 年间被中国人竞相翻译,先后有六种译本问世,文明书局出版的侯士绾译本,干脆将其译为《新史学》(1903 年),这种状况在中国近代史学乃至近代学术史上都是少有的现象。二是新史学论著纷纷出版,特别是中国历史教科书的重新撰写。如夏曾佑编写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共 3 册),先后由商务印书馆于 1904—1906 年出版,是中国近代最早编成的“第一部有名的新式通史”,[51]1933 年被国民政府定为大学历史教科书,并改名为《中国古代史》,影响广泛深远。吕瑞廷与赵澂璧编写的《新体中国历史》自 1907 年出版后,畅销十余年,至 1921 年时已经再版 20 多次。其他比较重要的有曾鲲化(署名“横阳翼天氏”)编写的《中国历史》(上册 1903 年、下册 1904 年)、刘师培编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1905 年)、夏清贻编著的《中学本国史教科书》(1905 年)、陈庆年编写的六卷本《中国历史教科书》(1909 年)等。这些教科书在编纂体例上无一例外地打破了传统史学的纪传体、编年体形式,而是采用西方近代历史学书籍的章节体形式。总之,新史学理论和实践上取得的这些突出成就,为近代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五)逻辑学

中国古典逻辑的历史渊源流长,最早见于先

秦诸子的名家、墨家等著作中,如《墨辨别》便是中国第一部经典逻辑著作,但囿于各种因素和条件的限制,中国古典逻辑并没有因此成长为逻辑学。中国近代逻辑学的产生,得益于西方逻辑学思想的传入和传播。如前述《名理探》一书,是西方逻辑学的首个中文译本,当然内容主要是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1886 年,英国逻辑学家耶芳斯著的《辨学启蒙》,由传教士艾约瑟译成中文,作为逻辑学的启蒙读物,书中介绍了培根、伽利略、哥白尼、吉尔伯特等人的贡献。这一时期的逻辑学译作还有傅兰雅译的《理学须知》(1896 年)、中江笃介著的《理学钩玄》(1902 年)、杨荫杭译的《名学》(1902 年)等。可以说,自明清始直至 20 世纪初,中国人通常按照"名学""辨学""理学""论理学"等中国古典逻辑思维来翻译和理解西方逻辑学。

近代中国逻辑学的创始人是严复。他不仅大量译介西方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而且十分注重对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逻辑学的介绍。1900 年,严复在上海创办名学会,讲授逻辑学。1902 年,他翻译出版了穆勒的经典著作《穆勒名学》。作为反映 19 世纪中后期西方资产阶级经验主义思想的极具代表性逻辑学著作,该书在继承培根倡导的归纳逻辑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求因果方法,建立起归纳逻辑的完整体系。尽管严复在该书中首次将"logic"译成"逻辑",且多次提及这一概念,不过他更倾心于将之译为"名学"。这不论是从本书译名还是从几年后严复翻译耶芳斯著作《名学浅说》的译名上都可以得到印证。因此说,严复对近代中国逻辑学的思考,既有西方逻辑学的归纳法、演绎法的学理,同时蕴含着中国古典逻辑中"名学"思辨的传统。正如蔡元培所言:"严氏于《天演论》外,最注意的是名学……严氏觉得名学是革新中国学术最要的关键。"[52]

《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两部译作的出版,推动了西方逻辑学在中国的译介,也推动了中国近代逻辑学的发端。郭斌指出:"吾国逻辑之学素不发达,思想笼统,成为心习。先生首先翻译西洋逻辑名著,提倡慎思明辨之风,其功实伟。"[53]郭湛波也强调说:"自严先生译此二书,论理学始风行国内,一方学校设为课程,一方学者用为致学方法。"[54]这些逻辑学译书既有诸如十时弥的《论理学纲要》(1902 年)、大西祝的《论理学》(1906 年)、随文的《辨学》(1908 年)等学理著作,也有适合于大中小学的教科书,如日本富山房编写的小学教材《论理学问答》(1903 年),东京帝国大学文科教授服部宇之吉编写的中学教材《最新论理学教科书》(1908 年),以及服氏编写的大学教材《论理学讲义》,该书原是作者 1902—1909 年在京师大学堂任师范馆正教习时讲授"逻辑学"的课程提纲,后将讲义稿本加以润色,撰成汉文,于 1904 年由富山房正式出版。

除上述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逻辑学外,法学、教育学、伦理学等学科也在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传播大潮中开始了孕育和产生。一方面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在中国的落地与生长,另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近代转型,这两方面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科学孕育和生成的两条重要渠道。有意思的是,这两条渠道大多数时候并不泾渭分明,而是复杂地纠缠在一起,展现了近代中国社会科学的丰富性和多彩性。

注释:

〔1〕鞠德源:《清代耶稣会士与西洋奇器》,《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 年第 1 期。

〔2〕张晓:《近代汉译西学书目提要(明末至 191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7 页。

〔3〕〔6〕〔美〕钱存训、戴文伯:《近世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戴文伯译,《文献》1986 年第 2 期。

〔4〕冯天瑜:《明清文化史札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78 页。

〔5〕〔英〕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李珩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128 页。

〔7〕〔10〕〔15〕〔37〕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修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6,396、407,446 – 447,520 – 523页。

〔8〕傅德元:《〈富国策〉的翻译与西方经济学在华的早期传播》,《社会科学战线》2010 年第 2 期。

〔9〕何勤华:《〈万国公法〉与清末国际法》,《法学研究》2001 年第 5 期。

〔11〕王宏斌:《〈防海新论〉与同光之际海防大讨论》,《史学月刊》2002 年第 8 期。

〔12〕〔1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165、1144,1167 页。

〔13〕〔苏〕齐赫文斯基:《中国变法维新运动和康有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 年,第 352 页。

〔16〕转引自张硕:《汉学家花之安(Ernst Faber)思想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 年,第 22 页。

〔17〕康有为:《南海康先生口说》,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 年,第 31 页。

〔18〕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 年,第 367 页。

〔19〕刘雅军:《李提摩太与〈泰西新史揽要〉的译介》,《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6 期。

〔20〕邢兆良:《是"误译"、"误读",还是主动选择——近代科学文化的传播与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4 期。

〔21〕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外一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 3 页。

〔22〕〔42〕〔46〕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 1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年,第 45、69、93 页。

〔23〕〔24〕郑振铎编:《晚清文选》,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399、581 页。

〔25〕张绪山:《论 20 世纪初中国社会的"科学信仰"——以归国留学生骨干为分析对象》,《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2 期。

〔26〕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论严复与严译名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年,第 41 页。

〔27〕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第 4 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104 页。

〔28〕〔美〕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雷颐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4 页。

〔29〕冯志杰:《中国近代翻译史》晚清卷,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年,第 44 页。

〔30〕〔34〕〔美〕西奥多·波特、多萝西·罗斯主编:《剑桥科学史》第 7 卷,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 年,第 438 – 439 页。

〔31〕转引自咏梅:《中日近代物理学交流史研究(1850—1922)》,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124 页。

〔32〕〔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 年,第 229 页。

〔33〕周晓明:《多源与多元:从中国留学族到新月派》,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59、66、54 – 55 页。

〔35〕马祖毅等:《中国翻译通史(古代部分)》,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 年,第 401、390 页。

〔36〕杨寿清:《中国出版界简史》,上海:永祥印书馆,1946 年,第 24 – 26 页。

〔38〕向瑞琨:《序》,〔日〕金井延:《社会经济学》,陈家瓒译,上海:群益书社,1908 年,第 1 页。

〔39〕李天纲编校:《万国公报文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年,第 595 页。

〔40〕黄河主编:《经济科学学》,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 年,第 308 页。

〔41〕参见宝成关:《西方文化与中国社会——西学东渐史论》,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 年,第 411 页。

〔43〕汤志钧、陈祖恩、汤仁泽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年,第 231 页。

〔44〕《谭嗣同全集》(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 293 页。

〔45〕王栻编:《严复集》第 1 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6 页。

〔47〕马勇编订:《章太炎全集(译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45 页。

〔48〕许仕廉:《中国社会学运动的目标、经过和范围》,《社会学刊》1931 年第 2 期。

〔49〕〔50〕梁启超:《新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年,第 85、91 页。

〔51〕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第 2 卷,1949 年 10 月。

〔52〕沈善洪主编:《蔡元培选集》上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 年,第 71 – 72 页。

〔53〕郭斌:《严几道》,《国风月刊》第 6 期,1936 年 6 月。

〔54〕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第 177 页。

〔责任编辑:汪家耀〕